



美国研究丛书
孙哲 主编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WRITINGS ON AMERIC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1979—2006.

美国学

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
(1979—2006)

孙 哲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国研究丛书 孙哲 主编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WRITINGS ON AMERIC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1979 — 2006.

美国学

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
(1979 — 2006)

孙 哲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1979~2006/孙
哲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美国研究丛书/孙哲主编)
ISBN 978-7-208-07669-3

I. 美... II. 孙... III. 中美关系:外交关系—研究—
1979~2006 IV. 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2813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张 晗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美国研究丛书 ·

孙 哲 主 编

美 国 学

——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1979~2006)

孙 哲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5 插页 4 字数 343,000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978-7-208-07669-3/D·1341

定价 36.00 元

编者的话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的评论,热情洋溢地赞美了中美两国的友谊和共同的价值观: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浩淼连天、碧波万顷的太平洋,早已把中美两国连接在一起;对民主与科学各自追求,又使这两个区别极大的国家都对世界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中美两国作为两大政治实体,近代以来有过许多恩恩怨怨,这是因为两国的政治传统、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架构、政治举措乃至政治语言、政治逻辑、政治色彩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不少方面甚至是截然对立的。中美政治之“对立统一”,曾有一度使得矛盾双方互为前提、互相制约、互相斗争得“天昏地暗”。但社会发展到了当代,中美两国人民的伟大智慧,正不断推动两国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美国 and 世界各国带来光明与幸福。当然,目前两国之间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之外,还横亘着台湾、贸易、国家形象等诸多“巨型水雷”。但是,中美两国的联系和依存不可能被任何力量嘎然切断,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更是源远流长,历久弥坚。

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的内政和对外工作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浓墨重彩、气势恢弘的和平发展的时代画卷。但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也向我们提出了很多实际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促成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而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也使美国感到非常困惑。目前,很多美国人感觉到,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几乎是每一个美国国内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应对中国的发展,从军事到政治,从贸易到文化,美国国内开始了十分认真的针对中国的观念及体制上的变革。

美国的经验既可以提供中国现代化建设参考,其行为的不确定性也成为中国未来能否和平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从对美外交角度来看,如果只知己、不知彼,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的行为模式,更无法预测未来美国对华决策可能发生的“突变”。例如,同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由于双方所存在的“知觉”和“错误知觉”,对这个词的理解有很大分歧。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道德中,盟友与伙伴是应当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而美国人在巩固其霸主地位之时,常常忘记了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反而显示出极为自私的国家特色。通观美国与其战略同盟者在过去多年来的合作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早已习惯于倾其所能地压榨战略同盟者,特别擅长通过国会、媒体等不同机构来驾轻就熟地“制造摩擦”,“火中取栗”。说

得不客气一点,我们如果遵循自己的传统道德理念来与美国打交道,那么很有可能令美国得寸进尺,或使部分民众面对新摩擦的不断出现滋生仇美情绪,引发对我们自己政府外交能力的怀疑;或使我们不得不陷入某种为减少摩擦而牺牲自己利益换取和平发展时间的固定对美外交模式。我们不能不未雨绸缪,全力加大对美国的研究,以美为鉴,谋祖国富强之路。

研究美国,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耐人回味的国家,从立国至今一直顽强地按照自己的国家发展逻辑在运转。早期的欧洲人在谈论美国的时候,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不屑的眼神,把美国人看成是一群“缺乏涵养的暴发户”。而在许多国人眼中,美国也无法摆脱“美丽的帝国主义”、“有点良心的强盗”等诸如此类的形象,面对美国繁华、强大、辉煌的一面,我们内心不时警醒自己,去捕捉这个帝国的负面影子。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不能说没有犯过错误,但很少出现导致国家发生重大倒退的决策失误。相反,美国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一路走来,而且还将一路走下去,即使面对防不胜防的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也毫无调整自己国家逻辑的迹象。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独特精神气质并且满怀激情地妄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推广到全世界的国家,任何其他国家和文明共同体都不得不对其高度关注。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国,研究美国是一项具有历史眼光的伟大事业。

研究美国,可以奠定我国美国学学科的基础,促进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和繁荣。在全球化飞速跃进的时代,美国学应当努力寻求并确立自己独特的学术支点和多维的研究画面。美国学需要立足于对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独特逻辑的考察,探讨美国在建国两百多年时间里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从中发现美国得以强盛的内在规律、美国当下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美国未来的走向。美国学更需要放宽考察视野,不仅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角度看美国,更要从美国自身看美国;既要有历史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也要有具体案例的微观透视,力争从众多角度、层面和视角对美国进行立体考察,从而发现美国不同维度的丰富内涵。同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美国,可以帮助我们架起沟通两国的桥梁,消弥时而出现的误解,解决此灭彼生的矛盾,共襄和谐世界的建设。从学术角度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祖国的强盛服务,是每一个负责任并有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组织编写了这套《美国研究丛书》。

在推动美国学研究的宏大规划中,出于学科发展和现实实践的需要,本丛书设想从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研究入手,计划逐步拓展到对美国的全方位探索,分批推出一些研究课题。《美国研究丛书》第一辑计划出版的学术著作有:

作为丛书长篇引言,本人拙作《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1979—2006)》探索了美国学在中国的诞生和成长,为读者诸君提供了一条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线索。通过展现和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美国的种种学术努力,笔者试图透过这面“中国镜子”,探究中国美国观中的激情与浪漫,缜密与豁达,民主与科学。而这面镜子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还原”美国的真实,从中看到我们自己民族的成长。

丛书首批入选之作是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的。

第一,如何真正把握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国情和政情,了解其政府运作和社会结构的特点?

沈国麟博士的《控制沟通: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从理论探索、结构考察、行为考察和制度考察这四个部分探讨了美国政府的宣传行为在整个宏观政治结构中所呈现出来的态势和受到的制约,并且从政治沟通机制的角度研究了宣传行为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媒体宣传行为的背后反映了国家想要利用媒体来影响和控制社会,追求和维护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达到其对内和对外的政治目的。

美国政府控制沟通和引导媒体,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兜售其政治产品,积极进行政治营销。目前作为博士候选人的张哲馨把美国著名政治营销学者布鲁斯·埃·纽曼的代表作《营销总统:选战中的政治营销》介绍给我国读者,使我们对美国政治选举中越来越多的营销现象以及政治家的营销理念有了大致的了解,实为中国的美国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今后,我们将陆续推出一系列相关著作,对美国的政治公关与政治营销实践,包括政治竞选技术和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等等,作出更为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第二,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内政,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运动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外交决策。内政决定外交,仍然适用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特别在涉及对华关系时,更是如此。以下两部著作都是从美国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的角度来研究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

孙哲和李巍合著的《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紧扣近年来不断升温的中美经贸问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对外经济决策机制及其独具特色的国会政治在其中的影响。如果把整个中美关系比作一个大棋局,许多不同种类的棋手都同时参与这场博弈,那么美国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却经常被忽略的关键棋手。本书全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国会政治的发展对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的影响以及未来的演进方向,以方便中国读者、特别是决策者,理解美国国会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所产生的各种正负影响,便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调整 and 变化时,做出理性而正确的政策回应。

张春博士的《美国思想库和一个中国政策》从总体上考察了美国思想库的主要类型以及发展历程,择其大者进行细致研究,不仅介绍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而且深入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在一个中国政策上的不同主张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的不同影响。

第三,中美两国本身都在经历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实践的巨大洗礼过程中,中国如何主动开展对美交往?如何在两国交往中获得更大的战略主动,巧牵牛鼻,以智取胜,谋求我们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以下两本著作分别从历史和实现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对美交往的一些重要问题。

台湾学者习贤德博士的《孙中山与美国》对中国现代伟人孙中山先生与美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全面探讨了中山先生一生与美国的交往及美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部著作的手稿是笔者2005年在台访学期间偶然拜读到的,后经周阳山教授介绍,才辗转与作者取

得了联系,得到出版授权。因原文较长,笔者为适应大陆读者的需要,在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亲自对原稿进行了修改和注释编辑。

外交非外事,外交需要大的战略和智慧。在过去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最成功的经验是奉行“敢斗愿和”的原则,有理有据地争取了国家的最大利益。随着国力的增强,国际经贸往来的发展,我国对美外交总体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召纳新的熟知内政外交人才,迫切需要推出新的战略思路和新的“前瞻性外交”对策,迫切需要进行一些决策及工作体制方面的具体改革。

赵可金博士的《竞争中的对话——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提出了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在传统外交不断受到新型外交(如经济外交、能源外交、文化外交等)冲击的情况下,赵博士不仅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公共外交的表现和特征,而且针对中国对美交往,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建议和主张。如何在保留我们文化特色的同时,也能将我们想宣扬的信息传递给思维和价值观不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民众,获得他们的认同,以提升和巩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这也是我们常常思考并希望能有机会为国家贡献心力和能力的一件事情。对此,这部著作可视为一种重要的努力。

笔者在美多年,感觉东西方文化各有特色,如中国人含蓄低调,而美国人却偏好直截了当。同样是馅饼,我们讲究内容,“包子有馅不在褶上”;美国人爱吃的比萨,却是将所有的东西都铺在上边,让人一目了然。同样是演说,中国领袖的演讲,行文简洁却内涵深刻,常常需要再三研习方能领悟一二;而美国听众大部分希望看到幽默风趣的讲故事高手,希望听领袖的演讲能像喝“可口可乐”那样,第一口就有刺激,清爽、简单而直白。

美国研究是一个无比宏大的课题。所有研究的背后,都具有强烈的中国价值关怀,有服务中国发展的欲求。我们从研究政治与外交关系入手,是因为中美政治关系引领着经贸、文化、教育、科技、体育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有些时候,其他关系也能给政治关系的改变提供重要的契机。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两国对抗了20多年,华沙谈判时断时续不时陷入僵局了无结果。举世之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僵局竟是通过中国乒乓球队“乒乓外交”打破的。在中美交往的历史中,可以勾沉无数诸如此类故事。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中美政治关系,而且要研究中美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体育、宗教、法制乃至心理、语言等等,这些学术努力都是促进中美交流的必需。因此,《美国研究丛书》计划逐步扩大作者队伍,不断拓展著作选题。同时,中美关系的促进与发展,决非中国单方面的事,也决非中国单方面努力所能成就的伟业。因此,本丛书不仅包括本国学者的著作,也包括外国学者的译著。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要将这套丛书逐一介绍给美国同仁,介绍给全世界各国的朋友。

丛书的策划是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启动的,后期的编撰则是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完成的。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对我的培养和清华大学对我工作的支持。

感谢杨泰俊先生、上海人民出版社李伟国总编辑和赵荔红主任。杨泰俊先生的鼓励和

引见,李伟国总编的支持和安排,赵荔红主任的认真和协调,都是这套丛书得以问世的关键。

蝇头小字,却绵绵亘亘、不绝如缕地为文化与历史的传承,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书海沧桑,当龙腾虎跃、伟力万钧地为中美与世界的进步,再奉上熠熠生辉的智慧光芒。

蓝天作纸凭勾画,凌云健笔任纵横,我们欢迎每一个关心中美关系发展、致力和谐世界建设而又有决心与能力的专家朋友,加入丛书作者的队伍,为共同的事业携手并进;言为抒情嚶鸣意,文以会友无惮多,我们也欢迎每一个关心中美关系发展、致力和谐世界建设而又有余力和激情的朋友,进入丛书读者的队伍,互激互励、互动互补,为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和人类共同文明的建设共同携手,为和谐世界的建设奉献绵薄之力。

孙 哲

2007年9月10日

于北京清华园

序言：美国学在中国

我国历史学家牛大勇教授在《影响中国前途的一次空运》一文中，翔实生动地描绘了发生在 1945 年秋天的一段特殊历史。该年 8 月，东亚战局因美军迫近日本本土，苏军大举出兵中国东北而发生大转折。国共两党对此都缺乏心理和物质准备。而对中国的前途，在中国战场上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军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8 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后，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面临着由谁受降、由谁占领的问题。这对战后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此关键时刻，美国在华的一举一动成为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当时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中国共产党人，向延安美军观察组提出“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前方参加对日最后一战。美军观察组表示同意，他们将此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长期愉快合作的一点小小回报。8 月 25 日，这一批干部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军运输机从延安飞往太行山麓，又从那里赶赴各自的战区。这批干部是：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共 20 人，他们是当时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高级将领！^①这次美军空运仅用了几小时，使中共完成了本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需穿越黄土高原、黄河天险、晋南山地，甚至日军封锁线才能完成的战略部署！

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使人对中美关系的曲折复杂感叹良多。毫无疑问，美国之于中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国家。在国际相互依赖日益深入与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面前，无论中国对于美国，还是美国对于中国，彼此都是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最近几年来，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空前活跃，探索中国的热情日益高涨。中国如何应对？显然，我们只能更加积极、更加认真地研究美国，把美国研究当作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进行艰苦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科学来对待。当然，这种研究还应该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世界性的胸怀。

^① 牛大勇：《影响中国前途的一次空运》，载于《历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

第1节 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中国美国学研究的一面镜子

本书主要研究的内容集中在中国美国学的发展情况调查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视角？中国美国学是诞生、成长于中国的学问。它关注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融入了时代气息、中国特色和东方风格。笔者正是想透过这面中国镜子，来探究中国美国观中的激情与浪漫、缜密与科学。这面镜子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还原”美国的真实，从中看到我们自己民族的发展。

中国的美国学研究这面镜子虽然年轻，但却能折射出历史的沧桑。

中国美国学把中国对美国的感性的形象认知和理性的研究这两个主题结合为一体，不但反映了中国公众对美国的一般认知，而且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种种探索，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国观。可以说，中国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美国观是中国美国学发展的特定精神背景。

中国人的美国观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观”者，看也。美国观涉及什么人在用自己的眼睛看美国，是否仔细在看，用心在看。“观”的定位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对美国的评判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当然，在谈到对美国的形象认识时，我们一般倾向于区分出“公众”(the public)和“精英”(elite)或“领导阶层”(the leadership)两个群体。这三个概念之间其实很难进行严格的区分，尤其是后两个概念。《韦氏新国际词典》对“公众”、“精英”和“领导阶层”的定义分别是：“公众”指“全体国民”，或者“有组织的群体”，或者“一群具有共同利益或特征的人”；“精英”指“有着优越社会地位的部分群体”，或“能够施加影响、威望或拥有决定性权力的少数群体”；“领导阶层”指“领导他人的群体”。^①笔者选择研究中国学者的美国观，主要是认为中国学术研究确实既能折射出我国“公众”(指的是相对于“领导阶层”和“精英”而言的大多数普通公民)对美国的整体看法和态度；同时，也因为学者扮演的特殊角色和与政府关系密切，所以学者的美国观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我国官方政策对美国的认知和立场。

从知识分子角度看美国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大洋彼岸的那一大片土地仍具有魅力与神奇色彩。那一片土地曾经毫不留情地吞噬了大批中国劳工的生命，同时，它又培育了一批批中国的精英”。^②在探讨美国国家实质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掺入了一些感情因素。虽然看美国的时间和空间各不相同，主体、客

① Philip Babcock Gove, ed.,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Massachusetts: Merriam-Webster Inc., p. 1836, p. 736.

② 袁明：《对当前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看美国的几点思考》，载于《美国研究》，1989年第2期。

体都会发生变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看美国的时候,“往往要受到一个复杂的外部世界与一个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制约与影响。这些制约与影响,也许是中国至今还不能有一本像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那样从历史、文化的深度来全面论述中美两国著作的主要原因”。^①

应当承认,中国人看美国时一直受习惯的、传统的、具体的看问题的角度、思维方式、语言词汇等因素的固有限制。中国对美国的看法虽然有了极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宛如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呈现不同状态的沙丘,如果不深入研究沙丘之下支撑着的实质的、具体的东西,那么一阵风刮来,沙丘马上就会成为平地。演进中的美国观具有流动的性质,其背后的中国情感,更是随中国自身成长而变化。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作一个客观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中美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使得中国当前几代知识分子都没有完成在客观的、系统的基础上了解美国、研究美国的工作。要想把握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笔者首先确定了本书在研究内涵上的三个主要内容:

首先,本书试图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时期对美国国家形象的看法。美国究竟被视为中国的敌人还是朋友?其对华总体战略是什么?如何理解中美关系的实质?其次,中国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内政外交领域的认知究竟如何?这里,笔者重点考察中国学者对美国政治与外交的研究,以此寻求中国美国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最后,中国美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政策影响及立场倾向如何?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认知活动,离开对他们文章、著作及其他学术或非学术活动的分析,我们无法发现和探索他们的心路历程。

本书也试图深入研究中国美国学生成及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成长机制,包括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观察美国、分析美国大的国际环境、国内生态及个人因素等等。例如,后冷战时期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两极格局的解体导致了中美战略态势的相对变化,“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又使美国内政外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美国观形成及中国美国学发展的宏观背景。

当然,中国1979年以来沧海桑田的变化,也使知识分子内心经历了复杂的洗礼。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思潮中的主旋律是“启蒙与救亡”;今天的中国更加追求现代化和民主化,追求和平与发展。如果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世界是与中国在近现代在列强的挤迫下所走过的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密切相关,那么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复杂内心世界的变化不仅带有较一般的民族主义感情更为深沉、理性、带有强烈历史感与责任感的忧患意识,而且也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某些困惑、浮躁、不安等新时代的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统一的美国观,其心目中的美国形象甚至是矛盾、前后不一、支离破碎、毫不完整的。不仅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没有统一的美国观,就是单一个体,在

^① 袁明:《对当前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看美国的几点思考》,载于《美国研究》,1989年第2期。

不同的议题领域,也会具有对美国形象的不同感知。历史变迁、意识形态、角色身份、人生经历等多种国际、国内、个人因素都会作用于中国知识分子美国观的最终形成,也都会从各个侧面影响中国美国学的发展。

第2节 学术的美国观影响着中国美国学的发展

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直接决定了中国美国学的发展状况。真正美国学的创立,从宏观上应该先争取完整布局,然后就具体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例如,美国学学者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美国学研究是否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制?如果有,如何表现出来?中国学者在谈论美国政治的时候,是否有意回避对美国民主的评判问题?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评判是否过多地从中国角度考虑问题?笔者在高校任教多年,一直也在试图总结中国在培养和训练美国研究专门人才或专家方面的成功和经验教训。三四年前,笔者有意选择50名目前在中国最为知名的美国问题专家,希望能够分析一下他们的背景、年龄层次、专业特长、学术研究情况,然后看一看他们之中到底有哪些专家更有影响力,哪些已经成为我国美国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哪些专家直接或间接参与过对美外交政策的决策或发挥过影响。但是做这项工作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很难确定名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国,学术界也难免带上“官本位”的色彩,如果真的按照学术成就来排个名次,恐怕会引起许多争议,绝非笔者所愿,更非笔者力所能及。即使勉为其难确定一个名单,我们也很难根据个人的学术背景来作更为深入的分析。比如说,绝大部分美国专家都去过美国深造或者进修,但是他们的成就究竟在多大意义上源于他们自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于国内的就读或者培训打下的基础,在多大意义上源于他们在国外进修特别是美国居住后的感悟?这也是非常难于梳理的一个问题。再比如说,中国美国学专家很多人都在大学任教,按照目前中国的教育机制,他们的努力是否可以培养出新一代一流的美国研究人才?如果把一流人才作为产品,那么中国的培养和教育流程是什么?现在这些骨干教师的贡献又在哪里?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的复杂和困难:现在我国究竟有多少高校或研究单位在招收美国研究方面的博士研究生或者硕士研究生?历年毕业生素质如何?现在是否还在从事美国研究方面的工作?目前在校研究生的训练是否有值得改进的地方?这些问题,难以解答。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需要总结两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是有关美国观本身的研究著作和论述,二是关于中国美国学研究方面的相关资料。

关于前一类的著述,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之间的认识与形象问题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研究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崭新的陌生领域。最近十多年来,围绕着中国人的美国观及美国人的中国观,学者们已给予越来越多的关心和重视,并陆续有专门性的著作或研究成果问

世。严格说来,美国学者的一些著作虽然无法归入中国美国学研究的内容框架,但是从总体上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成果还是必要而有意义的。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美国学者欧大伟(R. David Arkush)、李欧梵(Leo O. Lee)编辑出版了《没有鬼的土地——19世纪中叶至今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①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撰写并发表过《美丽的帝国主义者》,^②杨玉圣、辛逸、胡玉坤编写了《我说美利坚》,^③杨玉圣还著有《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一书。^④另外,张济顺博士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利坚观(1943—1953)》、^⑤本森·李·格雷森(Benson Lee Grayson)编的《美国的中国形象》、^⑥乔纳森·戈德斯坦(Jonathan Goldstein)、杰里·伊萨里尔(Jerry Israel)、希拉里·康罗伊(Hilary Conroy)编写的《美国看中国》都已问世。^⑦这还不是全部。我们还能看到王景伦所著《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⑧保罗·埃文斯著以及陈同等译的《费正清看中国》、^⑨侯且岸所著《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⑩T. 克里斯托夫·杰斯珀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所著《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⑪李洪山和洪朝辉编的《形象、认知与中美关系的形成》、^⑫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Robert Isaacs)著《美国的中国形象》、^⑬托马斯·博克(Thomas Bork)和丁伯成所著《大洋彼岸的中国梦幻——美国“精英”的中国观》、^⑭以及陶美心(Maxine Thomas)和赵梅主编的《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⑮等相关著作。

笔者认为,在英文著作方面,美国沈大伟教授1992年出版《美丽的帝国主义:中国对美国的认知(1972—1990)》一书非常值得推荐,该书专门讨论中国的美国研究,虽然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将中国学者划分为左中右三派,^⑯但其中有不少实证调查,因此可以说是一部美国学研究人员必读的经典之作。

① R. David Arkush and Leo O. Lee, *Land without Ghosts: Chinese Impression of America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California: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9.

②⑬ David L. Shamba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③ 杨玉圣、辛逸、胡玉坤:《我说美利坚》,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④ 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⑤ 张济顺:《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利坚观(1943—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⑥ Benson Lee Grayson, ed.,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 New York: Fridridge Angle, 1979.

⑦ Jonathan Goldstein et al., *America Views China: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Then and Now*, New Jersey: Lihayi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⑧ 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

⑨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⑩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⑪ T. Christopher Jespersen,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⑫ Li Hongshan and Hong Zhaohui, eds., *Image, Perception, and the Making of U. S. -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⑬ 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

⑭ 托马斯·博克、丁伯成:《大洋彼岸的中国梦幻——美国“精英”的中国观》,外文出版社,2000年。

⑮ 陶美心、赵梅:《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在中文著作领域,笔者特别推荐杨玉圣、张济顺和陶美心、赵梅等作者关于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的研究成果。

杨玉圣的《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实际上涉及一个至关重要而又十分切身的启蒙课题: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美国为什么让我们如此又恨又爱?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美国为什么始终是个谜?是因为美国曾经给我们太多的希望,还是因为美国曾经给我们太多的失望?作者认为,不管怎样,在中国人处理与美国人的感情、交际和友谊或仇恨当中,确确实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这个深层的鸿沟仍然很难甚至不可能被逾越。

《中国人的美国观》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中国人的美国观演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美国学研究方面开启了一扇非常重要的窗口。作者在审视中国人如何认识美国的同时,也督促中国人认识自身,触发读者进入更深一层的相关思考。例如,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国人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深刻地认识到: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试举今天下环球各国而观,惟问民之无权者,其国能昌盛否?又问民之有权者,其国能衰败否?”^①即便是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段话至今读来仍能振聋发聩。作者认为,欧美的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远在古老中国的儒学德教之上,其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仍无所不在地贯穿在欧洲精神与美国思维当中,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对美国的研究就会出现种种误差。

这里并不是说《中国人的美国观》具备有如何高屋建瓴的历史哲学高度,但它至少为如何理性地认识美国、历史地看待中国人眼中和观念中的美国提供了种种参照的可能性。杨玉圣教授在书中对中国人的美国观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有效考察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痛定思痛,教训是深刻的。如何看美国,其实说到底是与如何看自己密切相关的。”这不但切中要害,而且堪称精到。^②

与杨玉圣著作主题有关的另外一部著作是复旦大学张济顺博士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1943—1953)》。该书运用后殖民理论对1943至1953年历史大转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所受的权力制约、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和建国后“一边倒”的战略格局四个角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作了缜密的分析。^③

张济顺博士在“导论”中首先阐明宗旨:“我希望笔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不再是我的主观臆想,也不再是某种价值裁定的概念的产物,而是血肉之躯的思想、情感与精神的真正体现”。^④在作者看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

① 转引自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吴励生:《学术·学术批评·学术共同体——关于杨玉圣学术志业的综合批评》,载于《云梦学刊》,2005年第2期。

③ 张济顺:《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1943—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④ 同上书,第3页。

为权力所异化，他们的美国观由其地位和对权力的认同所决定”。这里，作者以步入民国权力中心的留美学生群体如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等为例，辛辣地点明他们公开亲美的目的只不过是“尽力争取美援而避开美国的控制”，自己像美国人那样富有，但仍需要占有中国的全部权力。第二类知识分子如胡适、蒋廷黻等“既与现政权若即若离，不想事事苟同，又企图‘捍卫’自己的美国认同及美国知识的‘纯正性’，他们在权力与知识之间寻找着夹缝，其结果往往又落入权力的陷阱”。这类知识分子处于社会中心权力的半边缘状态，在理念上也完全接受了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对美国政治文化有着高度认同。在美国霸权主义激发起来的日益强大的反美政治思潮和反美运动中，他们的特殊身份和执著信念决定了他们采取躲避甚至回击态度，以更坚定地倒向美国来克服美国霸权主义阴影造成的认同危机。第三类知识分子以傅泾波、陈光甫为代表，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有着独特和深入的认识，对其危害也颇有警觉，却又在现实中不得不仰仗美国。究竟是什么使这群“学者—官僚”型的知识分子坚持亲美的政治立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权力与知识中间寻求内心平衡的同时，身不由己地越来越陷入日益深刻的人格分裂之中。^①

作者认为，受个人政治认同和权力网络的制约，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里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现实权力考虑。在美苏两家、国共两党全面对峙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美国观无不在强国之梦的两大基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之间徘徊：是向右转，追寻所谓美国式的自由，还是向左转，摒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进而追寻民族主体意识的弘扬？尽管他们各自作出自己的抉择，现实政治的巨大洪流还是要将这些抉择加以总体的整合。表现在建国之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的权力运作，荡涤了美国文化，转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文化价值观念，使得他们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知识分子，最终摆脱了美国文化霸权的控制。而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在表面上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服从了统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但是在认同上，中国知识分子“并未建立对美国和西方文化自觉的批判意识”，表面的整齐划一之后仍然埋藏着巨大的疑虑和迷惘。^②

除了杨玉圣、张济顺博士的著作之外，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陶美心(Maxine Thomas)、赵梅主编的《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收录的论文和报告对中美双方彼此认知存在的差异、根源等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该书由三篇调查报告(赵梅的《中国人看美国》和陶美心的《“中美对话”研究报告》、多博研究会的《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的深度分析》)、10篇相关的评论性文章组成。内容上突出了立足于在充分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展开严谨定性研究的特点，观点交叉互补，相得益彰。^③

① 张济顺：《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69，81，96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③ 陶美心、赵梅：《中美长期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以下内容概括皆出自本书，不再补注，特此说明。

赵梅的《中国人看美国》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复杂的“爱恨”情结交织,而且在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中无甚差别,“其中‘爱’体现在多数中国民众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的正面印象上,而‘恨’则表现在多数中国民众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负面印象上”。高度现代化、丰衣足食、科技发达、经济繁荣、人才聚集、综合实力强大、民主制度、多元文化、麦当劳、可口可乐、NBA等,成为受访者“一提到美国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的首选词汇。同时,当回答“用一个词描述美国当前的国际地位”时,“霸道”一词居各组人群调查结果之首。更应值得重视的是人们对问卷“您是否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的回答,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目前非但没有日趋衰落,反而在20世纪末因信息革命而有了新的发展,有的受访者还提出了“美国正在走向强大”的观点。这说明,在看待美国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国家及其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上,中国人的认识不仅越来越平和,而且也开始日趋务实和理性了。假如我们回首过去五十年来中美关系及其各自形象的莫测变幻,就应该承认,这是一个看似不起眼、而实则了不起的转化和进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60年代相比,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无疑是大为改观了,公式化的文字和被扭曲的形象不见了。同80年代的‘美国热’相比,当前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更加趋于理性化,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被抛弃。如今中国人既看到美国好的一面,也看到不好的一面。在他们眼里,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我认为,这种理性的审视态度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正常的状态。”

陶美心的《“中美对话”研究报告》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很少”,“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关于中国的新闻”。尽管在不少美国人的心目中,工作勤奋、有创造力、爱好和平、谦虚、守纪律、重视教育、讲求礼貌等成为“哪个形容词可以最恰当地反映你对中国人的看法”时的主要选择性答案,但“人口过剩和拥挤”、“侵犯人权”、“歧视妇女以及包括强制堕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贫穷而经济落后”等偏见,强烈地构成了同一批受访美国人的另一幅中国图景。这说明,如何切实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和理解,确实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无论是在闭塞的过去还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中美之间相互形成的形象和认识,就总体上而言,既有正面的、积极的方面,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另一方面。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卓有成效的努力,尽量将这种负面的、消极的形象和认识转化为正面的、积极的。可以说,消解误会,减少隔阂,加强对彼此国家的全面了解和深刻理解,无疑是富有挑战性的艰巨任务。作为负责任的学术研究者,在这一方面,不仅任重道远,而且大有可为。^①

有关美国研究的具体著作、论文情况在本书有关章节里将有较为详细的叙述,这里仅就国内学人做过的类似努力作些介绍并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就著作情况来看,总结中国美国学发展历程的尝试早已有之。1983年,四川大学历史

① 以上对《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的评论引自杨玉圣:《知彼知己的益举——评〈中美长期对话〉》,载于《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

系美国史组就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出版了《美国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82)》。^①同一时期,资中筠教授发表过《中国的美国研究》、^②杨玉圣教授发表过《80年代的中国美国学——回顾与思考》^③等文章。为了对中国人的美国观作一历史的考察,杨玉圣教授还和胡玉坤先生一起,对1979年至1989年间中国的美国学成长进行过分析,其研究成果就是辽宁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一书。^④该书收集了1979年至1989年间我国研究美国的有关中文论文、译文及资料的目录,覆盖10大类美国学论文。该书还提供了1981年至1989年期间我国有关美国研究的硕、博士学位论文题录。应该说,杨玉圣教授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尝试和探索,为笔者写作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例如,他曾在1993年至1994年期间和王缉思、金灿荣等教授一起发起并组织了《中国美国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的课题研究,希望能将其作为一部系统、全面地反映和总结晚清以来中国人探索美国的学术行程的大型专业工具书出版,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中国的美国研究、促进海内外(包括海峡两岸之间)美国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协作。他还曾呼吁组织国内人力、物力来尽早编撰一部包括译书在内的综合性的《中国美国学文献总目录》。^⑤除杨玉圣教授之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黄安年教授亦曾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对中国的美国学研究加以分析。^⑥如《1988年以来中国美国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活动》、《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改革开放与中国美国学的发展》及《2000年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定量分析》^⑦等文章已广为流传。黄安年教授创立的“学术交流网”(www. an-nian. net)还特别设计了一个“美国论著研究”的栏目,受到国内学界的一致肯定和好评。

1999年,严维明主编的《比较美国学》一书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运用比较

① 四川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组编:《美国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82)》,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83年。

② 资中筠:《中国的美国研究》,载于《美国研究》,1987年第1期。

③ 杨玉圣:《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回顾与思考》,载于《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

④ 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⑤ 杨玉圣:《重视我国美国学史的研究——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载于《社会科学报》,1989年4月13日;杨玉圣:《开展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几点初步想法》,载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第46期,1990年2月;杨玉圣:《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回顾与思考》,载于《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柯可:《〈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一书出版的意义》,载于《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8期;中国美国学硕(博)士论文题录(1981—1989),载于《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第6、9期。

⑥ 黄安年教授除编印了《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1990年)外,目前还在从事中国美国学信息库课题的研究。

⑦ 黄安年:《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1840—1990)》(上、中、下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90年内部发行;黄安年:《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版的美国史著译作纵览》,载于《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8期;黄安年:《十年,四十年和一百五十年美国问题中文著译作综述》,载于《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1期;黄安年:《1990—1995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成果及其国际比较》,载于《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黄安年:《改革开放与中国美国学的发展——以1998年发表的文章为个案分析对象》,载于《学术界》,2000年第2期;黄安年:《2000年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定量分析》,载于《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黄安年:《2000年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对当年文章的定量分析》,载于梁茂信主编:《美国社会发展与中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7页;黄安年:《1988年以来中国美国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活动》,载于《美国史研究通讯》,1995年4月第1期(总66期)。